

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3

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

金宽雄 金东勋 主编

ZHONG CHAO GU DAI SHI GE BI JIAO YAN JIU

ZHONG CHAO HAN RI WEN HUA BI JIAO YAN JIU CONG SHU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3

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

作者：[作者姓名] 出版社：[出版社名称]

[出版年份] [卷数] [期数] [页码]



[出版年份] [卷数] [期数] [页码]

ZHONG CHAO GU DAI SHI GE BI JIAO YAN JIU

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

ZHONG CHAO GU DAI SHI GE BI JIAO YAN 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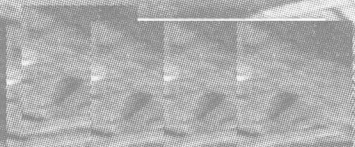
金宽雄 金东勋 主编

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ZHONG CHAO HAN RI WEN HUA BI JIAO YAN JIU CONG SHU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金宽雄,金东勋主编. —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5(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丛书;3)
ISBN 7-5389-1258-4

I. 中... II. ①金... ②金... III. 古典诗歌—对比研究—中国、朝鲜 IV. ①I207.2②I3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9441 号

书 名/ 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丛书(第三卷)
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

主 编/ 金宽雄 金东勋

责任编辑/ 全成光

责任校对/ 许 文

封面设计/ 咸成镐

出版发行/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印 刷/ 牡丹江邮电印刷厂

开 本/ 640mm×965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9-1258-4/I·429

定 价/ 3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是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这项研究成果,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这部学术专著吸收二十世纪中国、朝鲜、韩国的学者在中朝比较文学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试图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阐明中朝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古代诗歌在历史上交流与影响的一些规律和特点。虽然它还不够十分成熟和完善,但它毕竟是当代中国、朝鲜文学精英学者集体力量的成果。

这部书由金宽雄、金东勋任主编,金宽雄、郑日男、崔雄权、金红梅、许辉勋、金东勋、邹志远、金一、徐东日、金柄珉、朴正阳、马金科、蔡美花、李花、韦旭升等(姓名按本书目录中出现的章节顺序排列)15位学者共同撰写。具体的写作分工如下:

金宽雄撰写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第四节;郑日男撰写第二章的第一节;崔雄权、金红梅撰写第二章的第二节;许辉勋撰写第二章的第三节;金东勋撰写第二章的第五节和第八节;邹志远撰写第二章的第六节;金一撰写第二章的第七节;徐东日撰写第二章的第九节和第三章的第二节;金柄珉撰写第二章的第十节;朴正阳撰写第三章的第一节;马金科撰写第三章的第三节;蔡美花、李花撰写第三章的第四节;韦旭升撰写第三章的第五节。此外,金翼承担了全书的版式设计。

这部书是在资料尚不完备的基础上,短时间内赶成的,难免有疏漏和缺欠,敬请各位读者和专家斧正。

金宽雄 金东勋
2004年12月于延吉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中朝古代诗歌相互关联的背景.....	(2)
第二节 朝鲜古代汉文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关联的宏观描述···	(16)
第三节 朝鲜古代国语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关联的宏观描述···	(26)
第二章 中国古代杰出诗人对朝鲜古代诗歌的影响	(35)
第一节 屈原与朝鲜古代诗歌.....	(35)
第二节 陶渊明与朝鲜古典文学.....	(64)
第三节 王维与“海东诗佛”申纬的汉诗.....	(105)
第四节 李白与朝鲜古代诗歌.....	(120)
第五节 杜甫与朝鲜古代诗歌	(149)
第六节 白居易与高丽诗人李奎报的诗歌创作.....	(188)
第七节 苏轼与高丽时期汉诗.....	(196)
第八节 朱熹诗歌与朝鲜前期李退溪的汉诗.....	(209)
第九节 李德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双向反馈.....	(238)
第十节 清代诗人王士禛与朝鲜北学派文学.....	(254)
第三章 中国古代诗歌体裁、流派及形式对朝鲜古代诗歌的影响	(272)
第一节 中国乐府诗与朝鲜乐府诗.....	(272)
第二节 唐代格律诗与新罗汉诗的萌兴.....	(294)
第三节 江西诗派与高丽、朝鲜汉诗的发展	(317)
第四节 朝鲜中期女性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349)
第五节 朝鲜国语诗歌中的中国文学因子.....	(373)

第一章 绪 论

在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阻塞,各地间人员和思想文化的交流,十分缓慢,规模也很小。各个部落、氏族都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分别创造着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到了中世纪,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通手段的日渐发达,相邻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交流增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互相传播,各自的文化有不少沟通、汇合,逐渐形成了享有共同文化的文化圈。中国的著名学者季羨林在谈到中世纪文学时曾多次指出:“世界上有几个‘文化圈’,而且都辐射到一定的范围。中国是个文化圈,它辐射的范围是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国家都使用过汉字。”^①季羨林先生认为,世界上有四个最重要的文化圈,即“印度文化圈”、“波斯——阿拉伯文化圈”、“欧洲文化圈”、“中国文化圈”,而“中国文化圈”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个文化圈。至于“中国文化圈”这个名称,存在着不少不同的命名法,比如“汉字文化圈”、“汉文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等等。

韩国的著名学者赵东一先生认为,中世纪的各个文化圈里都有文化上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称其为“中世纪文化普遍主义”,它具有以下内涵:①共同的宗教信仰体系;②共同的语言文字符号;③共同的文化经典;④政治上的相互联系;⑤相似的文物、典章制度。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朝两国在以上几个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基于这种认识,赵东一先生进而提出了所谓“文化圈文学”的概念。他写道:“民族国家上一层的文学是文化圈的文学。韩国文学既是韩国文学又是东亚文学。它自从出现之时就既是东亚文学又是韩国文学,从宏观的角度上看,甚至作为韩国文学的汉文学以及口碑文学、国语文学也都既是韩国文学又是东亚文学。所有的韩

① 刘再复:《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国文学都具有既是韩国文学又是东亚文学的二重性。然而,长期以来对文化圈的文学视而不见,只注重民族文学,强调民族文学的独特性、排他性、优越性,其原因在于遵照近代国家的理念去研究文学。”^①

那么,中朝古代诗歌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得以产生和长期持续的基础是什么?这是在绪论里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中朝古代诗歌相互关联的背景

一、地理条件及其他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受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地理上的远近、交通状况、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都各自起着促进或阻碍文化交流的作用。朝鲜地处朝鲜半岛。三国时期,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部分领土延伸于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地区。半岛西南部分为百济,东南部分为新罗。七世纪60年代,百济、高句丽先后灭亡,新罗占据了百济的全部土地和高句丽东南端的部分土地,为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国,初步奠定了基础。

公元918年,新罗王朝覆灭,高丽王朝建立。到十四世纪末(1392年),高丽王朝为李成桂推翻,朝鲜王朝建立。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直至1910年,为日本所吞并。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南部为“大韩民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它迄今仍处在南北分裂、对峙的状态。

朝鲜半岛位于北纬43度至33.06度之间,东经131.52度至124.11度之间。国土面积为22万平方公里,北与我国东北地区毗邻,西与我国华北隔海(黄海)相望。

在中国周边的邻国中,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地区最近的国家,是蒙古和朝鲜。蒙古在独立以前,曾经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它还曾建立过元朝,统治过整个中国国土。但是,在文化关系上,它远不如朝鲜和中原汉民族的文化关系那样密切,在对汉民族文化的接

^① 赵东一:《既有共性又各具个性的东亚文学》,知识产业社(韩国),1999年,第18页。

受上,它远不能和朝鲜相比。原因很简单:

1. 朝鲜和中原地区的陆路交通无需横越大沙漠,路途比较顺当,加上还有海上交通。以唐朝和新罗的海上交通而言,有两条路,一条由山东循黄海道之西入仁川、大同江,另一条由全罗道西南角之灵岩方面,经黑山道而入定海(上海)。在高丽时期,由于辽、金的阻碍,大部分时间里,利用海上交通,而到了元统一中国大陆后,才得以利用陆路。明清时期,朝鲜王朝的使臣来往北京,往往采取仁川至烟台,再至天津的走法,也有沿辽东半岛东南海岸,然后渡渤海的。陆路则渡鸭绿江后至辽东、辽西,然后入山海关进北京。从平壤近处的南浦港到山东半岛的烟台,海路近 200 里。从汉城近处的仁川港到山东半岛的烟台,海路大约 200 多里,都不很远,由朝鲜半岛到江浙、福建一带,也不困难。这对于两国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很方便的地理条件。而蒙古与中原只有陆路交通,且横亘着大沙漠,与中原交通既不方便,特别是与南方如浙江、福建,更是山河阻隔,困难重重。这种地理条件,为它的贸易、文化交流造成了很大困难。

2. 朝鲜民族是农耕民族,而蒙古族是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两个民族文化影响之可接受性的大小。无疑,和中国汉族同为农耕民族的朝鲜民族,更易于建立起和中国社会类型相似的社会,更易于接受、容纳中国文化。

日本民族也是农耕民族,也能从海路到达中国,但比朝鲜远些,且无陆路可通。日本也大量接受了汉文化,但接受的比朝鲜晚,比朝鲜少,而且起初是通过朝鲜的传播,才间接地接受汉文化的。在这里,地理条件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样,朝鲜在中原附近的邻国中,具有和中国文化进行交流的最优越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它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么深长、密切而持久,便与此有关联。

二、“天朝礼治体系”中的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的政治关系

中国香港学者黄枝连对以“朝贡制度”为轴心的传统社会东亚文化圈内各国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①以

^①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而以礼仪往来(所谓“朝贡制度”)为其主要形式的区域秩序,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虽遭到一些挑战,但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定及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其框架下,朝鲜、越南乃至日本列岛,主动引进中华传统(尤其是儒学、儒术),用以指导社会生活,规范人们的心理活动。中国封建王朝是在内政上施行礼治体系的“天朝礼治体系”,在外事活动上施行大趋向和大框架政策,但在性质上与形式上,都有异于近代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殖民帝国主义。

韩国的苏在英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从公元前后时期到十九世纪末,朝鲜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可以概括为:

1. 朝贡关系成立前:三国时代前半期的关系(公元前后时期—316年);
2. 初期朝贡关系的成立:三国时代后半期的关系(317—668年);
3. 朝贡关系的发展:统一新罗、高丽和唐、宋的关系(669—1279年);
4. 朝贡关系的变质:高丽和辽、金、元的关系(918—1368年);
5. 典型的朝贡关系的成立:高丽、朝鲜王朝与明、清关系(1368—1894年)。

很明显,苏在英教授是以“朝贡”来概括传统社会(指近代社会以前的社会)里的朝中两国关系的。对于“朝贡关系的变质”,他有所解释。意思是,这是朝鲜和中国的某些少数民族王朝建立的、带有被迫性质的关系。尤其是元朝对于高丽,是违背中国历代“正统王朝”(指汉族所建立的王朝)与朝鲜历代王朝的正常关系的,且具有严重地干涉内政的性质。朝鲜与清朝的关系虽未被纳入“变质”范围之内,但他认为其中也有偏离正轨之处。

上述意见大体上反映了朝鲜一千多年和中国历代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与朝鲜的不正常关系中,就朝鲜方面来说,它一向以汉族代表中国,对汉族文化的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怀有尊敬,鄙视文化根底不深的少数民族王朝统治者;就少数民族王朝来说,有的对朝鲜确实采取了强制的、乃至压迫的措施,尤其是元朝对高丽朝政的任意干涉,清初对于朝鲜王朝统治者的侮辱性行为(迫令其承认清与朝鲜为“父子之邦”,强迫其国王对清帝行叩头跪拜之礼)等等。确实违背了朝鲜历代王朝与中国王朝之间的正常关系。

所谓“朝贡关系”,不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但在封建时代,在人

们的观念中,国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国力的强弱,是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主要根据。中国是大国是天朝,朝鲜是小国,也就形成了这种高低概念,进而产生了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朝贡关系,就体现出这一关系,这是在传统社会难以避免的关系。

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关系在政治上是否带有以武力为后盾的强迫性,在经济上是否互利互惠,还是单方面的、强制性的剥削。

大体上看来,朝鲜历代王朝(除上述所谓“变质”的关系以外)并未因对中国的朝贡关系而放弃民族自主性。朝鲜虽朝贡于中国王朝,但保证了自己的外交、内政、军事等方面的自主权。朝鲜送给中国王朝“贡品”,中国统治者也有“特赐”回赠;朝鲜给中国以“回敬”,中国统治者也要给以“礼品”。朝鲜给中国的有金银器、青瓷、人参、香油、松子、虎豹皮等等,中国给朝鲜的,也有金银器,还有漆器、锦、绢、象牙、玳瑁、车、酒等等。实际上带有物物交换,互利互惠的性质,属于两国的友好往来,可以称之为两国彼此自愿的“睦邻关系”。

这种“睦邻关系”在中朝关系中占绝大部分岁月。但它不是惟一的关系,还有过其他的关系。即:统治与战争。中、朝历史上的政治关系,大体上就是这三种关系的循环交错,而以友好、睦邻为主。

最初一个时期,是统治时期。

朝鲜及中国史书,多有箕子东往朝鲜开国的传说。商纣王无道,其叔父箕子谏而不听。周武王灭商后,箕子逃往朝鲜,被周武王封为朝鲜王,在平壤传了四十多代,约八、九百年。但在考古学上,对此没有圆满的、无懈可击的证据。

秦末,燕、齐、赵等地数万人民为避乱而逃奔到古朝鲜。不久,秦亡汉立,燕王叛汉,卫满率众千余人避乱,逃往古朝鲜,于公元前 194 年建立了史家称之为“卫满朝鲜”的国家,定都于大同江北之王俭城(即平壤),后国力渐盛,汉族之流亡者相继来定居。

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海陆两面出击,进攻卫满朝鲜,次年成功,遂在卫满朝鲜之地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四郡境域,包括除今庆尚道、全罗南道与咸镜道以外的朝鲜半岛全部地区。乐浪郡(在今平安、黄海道和京畿道的一部分地区)汉族较多,实行郡县制,由汉朝直接派遣官吏。其他三郡,则在汉朝郡县官吏监督之下,实行当地人



的自治。后汉桓帝时(147—162年)北部高句丽兴起,南部的辰韩、马韩、弁韩、濊族有所发展,乐浪居民逐渐并入韩、濊。

朝鲜半岛于公元前不久先后建立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进入三国鼎立时期,直至七世纪。三国之中,高句丽对汉、魏建立了朝贡关系。百济、新罗也于四世纪起,既通使于中国北朝,也和中国南朝的东晋、梁、陈等来往,朝贡、册封,使节常有来往。

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隋、唐时期,公元598年隋文帝以高句丽婴阳王率靺鞨万人入辽东掠夺为由,以水陆军30万,对高句丽发动了战争。但因洪水、疫病等困难而撤军。公元612年,隋炀帝集结110多万兵力(号称“二百万”),再次大规模进攻高句丽。在高句丽将领乙支文德的巧妙对付和高句丽军民的坚决反击下,大败而归。

唐王朝建立后,高句丽、百济联合进攻新罗。唐太宗李世民接受新罗的恳求,于公元645年、647年两度亲自率军出征,进犯高句丽,均以失败而告终。之后,新罗太宗金春秋派其子文武王金法敏到唐朝,面请出兵伐百济。唐应请,于663年攻灭百济。又于5年之后,新罗利用高句丽统治者的内部分裂,灭高句丽,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治朝鲜半岛北部与西南部的原高句丽、百济旧地。其后,安东都护府西迁辽东。新罗取得了百济旧地及高句丽东南端的部分领土。

自此以后,新罗和唐一直保持友好关系,每年派使臣赴唐朝贡,受唐册封。唐对新罗也常回赠礼品。新罗虽尊唐为宗主国,但在本国大政方针上,仍充分保持自己的自主权。

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935年新罗灭亡。高丽从此统治朝鲜半岛达450多年,直到1392年被李成桂推翻。

高丽建国后,对中国的后唐、后晋、后周都保持和睦关系,接受其册封,甚至废除自己的“天授”年号,改用唐、晋的年号。契丹兴起,势力甚强,高丽受其侵扰,不得不表示让步,受其册封,奉其正朔。后女真驱逐契丹,高丽对女真也采取同样态度,受其册封,但实为敷衍应付,其真心敬为“中华天子之国”的,是宋朝。

有这样一个故事:高丽使臣李资谅等至宋京,宋帝待之甚厚。临走,宋帝悄悄叮嘱他说:“似闻女真比壤,后日来朝,宜招自变量人与偕!”李资谅也向宋帝说了心里话:“夷狄贪婪,不可通上国。”但宋帝轻信佞臣之

言,未注意高丽使臣的忠告,对女真掉以轻心(事见崔滋《补闲集》卷上)。高丽甚至还忠告过宋朝,说女真乃虎狼之国,比契丹更凶恶,切不可依靠女真来对付契丹。宋帝不听。女真灭契丹后转而攻宋,宋京城被占,徽、钦二帝被俘,遭受了半壁河山易色的灾难。

后来元朝灭宋,高丽自王室至贵族,被迫与元朝皇帝或宗室通婚。元朝甚至一度将整个高丽置于元“征东行省”之中。

明于1368年灭元而立。高丽则于1392年被李成桂所推翻。李氏王朝建立,改国号为“朝鲜”。朝鲜王朝受明册封,对明朝贡,与明朝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1592年(壬辰年)日本大举侵略朝鲜。朝鲜因承平日久,国防松懈,首都汉城、故都开城、平壤迅即陷落。明神宗应朝鲜国王仁祖的一再恳请,先后共派水陆军20万支持。在朝、明军队并肩作战下,1598年将日寇赶出朝鲜,明军亦全部撤出朝鲜。自此以后,朝鲜更增加了对明朝的友好感情。

明王朝因政治腐败、农民起义以及对付国外战争已陷入困难重重的境地。东北的满族(后金)趁机而起,严重威胁明王朝。朝鲜顾念明朝支持的情谊,毅然应明之请,配合明军,攻打满族,但力弱不支,遭败。满族于1636年改“金”之国号为“清”,势力更盛。清太宗于同年亲征朝鲜,朝鲜国王仁祖被困于南汉山城达一个月之久。南汉山城陷落后,仁祖不得不接受清的侮辱性条件,向清太宗行叩头之礼,臣服于清。史称此次战争为“丙子胡乱”。

朝鲜历来认定汉族王朝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对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王朝持反感态度。遭丙子之辱以后,对清朝更为厌恶、怨恨。明朝于1644年(甲申)亡,清军进入北京,从此统治中国。但朝鲜慕明恶清的感情仍十分强烈,表面虽受清朝之册封,但文人士大夫均拒用清年号,明亡多年之后,仍一直坚持“崇祯后”的提法,以明朝为其年号,以示其对明朝的怀念。

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朝鲜统治者心中一直保持“思明恶清”的思想,但朝、清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始终维持,使臣来往频繁程度,不亚于以往。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仍是汉文化,清朝的统治,并没有完全影响两国的贸易活动和文人的交往。以使臣或使节团随员身份来的朝鲜文人,怀着对汉族文人的满腔同情,十分愿意和中国文人接触,彼此悄悄交谈肺腑之言,结下很深的友谊。



十九世纪,在欧美列强和日本势力的渗透下,清朝国势日衰。日本借机离间朝、清关系。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朝鲜的高宗王改称光武帝,表示其地位已不再处于清朝之下,而与清朝平起平坐了。这是朝鲜封建王朝的史无前例的做法,然而这并不是在国力非常强盛的情况下的称帝,而是恰恰相反。短短13年后,已经为日本势力充分渗透的“大韩帝国”被日本完全吞并了。

此后,中国的部分疆土也被日本侵略、霸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下,中国和朝鲜有相似的命运。两国人民共同举起抗日斗争的义旗,历史转入了另一个阶段。

三、中朝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中国史学家吕思勉在谈到源远流长的中朝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时指出:“貉介鲜卑、肃慎间。二族之文明程度皆低,而貉族独高。谓其自然发生邪?则其所处之地二族无异也。谓其与燕杂处,有所受之邪?则鲜卑、肃慎,亦未尝不与燕杂处也。今观其政教风俗,多极类华夏,又有可证其出于殷者。则朝鲜古国,必以貉为民可知矣。然则貉族古俗,不徒可见其族开化之迹,并可征殷之遗制。”^①在这里,貉族指朝鲜民族的祖先。从中国最早的《管子》、《史记》、《论衡》、《汉书》等中国史书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中朝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追溯到遥远的殷商时代,至于春秋战国时代中朝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中国的各种文献中更是斑斑可考。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包含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子系统。下面按这个顺序谈中朝之间的文化关系。

第一,中朝两国在物质文化方面的相似性。

吕思勉在谈到中国周边的众多民族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时曾指出:“东方诸侯,能传华夏文化者,固当以貉族为第一。”^②这似乎可以用国土的接壤、政治上的密切关系以及朝鲜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等原因来说明,但同样具备上述条件的蒙古民族,尽管也跟中国文化有交流的机会,为什么产生的结果不尽相同呢?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可能涉及复杂的方面,

①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②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但有个大前提需要考虑,那就是朝鲜和中国一样,都属于农耕民族。在共同的农耕社会形态上建立起来的农耕文化,彼此容易产生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的机能,一旦有了特定的需求,便有可能进入水乳交融的情境。在传统社会里,朝鲜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就呈现出了这种情境。朝鲜文学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并非纯然自发的活动,而是以朝鲜文学发展的主体需要为内在依据的。换言之,并非两种文学偶然碰撞,而是朝鲜文学根据需求做出的选择,因为中国文学符合作为农耕民族的朝鲜民族的文化心理。

第二,中朝两国在制度文化方面的相似性。

众所周知,物质文化中积淀、凝聚着制度文化的因素。在中国和朝鲜传统的农耕文化中积淀、凝聚着稳固的家庭制度。动荡不安常常困扰着中国历史,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始终非常稳固,在这一点上,朝鲜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和朝鲜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中国和朝鲜的历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家族天下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姓家族统治一个朝代,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这个家族就一直统治下去。因此,在中国和朝鲜的传统社会里,都存在“家国同构”的现象。“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由于古代中朝两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庭制度也深深地植根于数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结构之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了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利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这是中朝两国与印度、欧洲的重大区别。中朝两国在制度文化方面的相似性,使得其文化形态也具有相似性。

东亚文化圈的中国、朝鲜以及越南等国家实行的科举制度是在其他文化圈所没有的特殊的制度文化。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公元 587 年隋文帝开始设科取士,隋炀帝始置进士科,成为制度。唐代增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等科。武则天创行殿试,并增设武科。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明、清时期更为完备。各省每 3 年举行乡试,中者称举人。京城 3 年举行举人会试,中者称贡士。贡士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分三甲取录。一甲 3 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通称状元,第二、三名通称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



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分别授翰林院修撰、编修等官。

朝鲜古代的科举制度始于统一新罗时期。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许多新罗的文人、士大夫抱着对唐文化的炽热憧憬和折桂攀蟾的美梦,来到长安,积极吸收唐文化。一切以唐文化为楷模,并努力仿效,建立了类似于唐朝的政治、文化制度。如公元 682 年新罗仿照唐朝的国学设了太学,公元 788 年设读书三品科。所谓“读书三品科”是新罗封建王朝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而其主要的考试科目为《左传》、《史记》、《礼记》、《孝经》等。新罗不仅重视国内的教育,而且积极向唐朝派大量的留学生、修道僧,让他们在中国直接接受汉文化。唐朝国学有弟子数千,其中有不少新罗弟子。公元 840 年,仅这一年从唐朝完成学业回归新罗的学子竟达 105 人之多。在统一新罗时期先后在唐中举的新罗学子达 58 人。在唐登第的新罗人,有的在唐做官,而多数则归国。他们在唐学习或做官时,与唐代文人学士直接交往并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结下深厚的友谊,经常交游相会,论诗谈文。在唐登第的新罗人中,也有一部分因其才华横溢而在中国颇有盛名,其中崔致远成就最突出。他在唐朝末年登第,曾做唐僖宗年间的翰林学士。他擅长文辞和诗歌,著有《四六集》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后者流传至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文化遗产。

中国后周时期双冀(生卒年代未详)对高丽时期的科举制度的确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元 956 年,他作为后周的册封使薛文遇的随行人员来到高丽首都开京,因病滞留在开京,痊愈后高丽王朝的光宗欣赏双冀的才学,经后周朝廷的同意,把双冀任命为元菴翰林学士。公元 958 年,双冀建议光宗国王在高丽施行科举制度,当年 5 月举行了高丽建国以来首届科举,以诗、赋、颂、策为考试科目。到了高丽王朝时期,朝鲜的科举制度更趋完善,而且在汉唐儒学的影响下,与经学相比,词章受到加倍的重视。在整个朝鲜传统社会里,科举考试的科目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注重汉文学修养的词章历来都受到重视,而其中汉诗的创作占有很显要的地位。因而,吟诗写诗成了儒生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

总之,朝鲜因为长期以来实施以汉文学能力和水平为评价标准来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所以使用汉文的人文非常多,汉文学也水涨船高。

第三,中朝两国在行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

行为文化主要由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来体现。朝鲜传

统社会的婚丧嫁娶等礼俗,仿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婚娶必须通媒、纳彩,父母去世,守孝三年。高丽时期,就已盛行地理风水之说。历法用中国的阴历。朝鲜民族的家庭观念较浓,注重“合家团圆”和“四世同堂”,一年一度的春节,届时家人皆以长辈为核心,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中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呈现出一种内向的性格行为。每年初一向父母拜年,给孩子压岁钱。上元节、清明节(寒食)、端午节、中秋节的岁时风俗,皆与中国习俗相似。

第四,中朝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相似性。

精神文化,是由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因素所构成。精神文化或称“心态文化”、“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大众心态;社会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心理经过系统的理论整理或艺术的处理升华,曲折而深刻地反映社会存在如书籍、绘画、雕塑等固定下来,能播扬世界,流传后世的意识形态。

朝鲜上古社会的大众心态典型地表现在巫俗上。它是围绕着农耕经济这一核心,带有明显的尊重自然、敬重祖先等特征。尽管上古时期朝鲜社会的这些社会心理没有像中国那样经过系统的理论整理或艺术的处理升华,但在文化精神的根基上有着很多相通、相似之处,这对朝鲜后来长期而全方位地接受中国的精神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下面谈谈中朝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关系。

首先谈中国艺术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1)音乐、舞蹈方面:这方面,彼此相互的交流较多。朝鲜最早的音乐发展情形,可以在高句丽四世纪的安岳三号古坟壁画上看起来。这是一幅“鼓吹行列图”,其中大约包含 250 多人的乐队,乐器有六弦琴、四弦琴、横笛、箫,还有太鼓、建鼓、钹、箜篌、琵琶等等,表现出中国中原及少数民族地区音乐和高句丽音乐的关系。

古代朝鲜的音乐,也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宫廷音乐中,除龟兹、高昌等异域音乐以外,高丽乐、新罗乐、百济乐,都列入乐府,占有重要的位置。

朝鲜的古老乐器伽椰琴,于六世纪出现于朝鲜半岛南端的小国伽倻。伽倻国嘉实王见到了唐朝弦乐器箜,就命令乐师于勒仿造,改制成 12 弦的伽椰琴。琴音色优美,传用至今,是极富朝鲜特色的乐器之一。公元